

辛秋水 等著

CHUANTONG WENHUA YU XIANDAI WENMING XIANGDUIJIE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 相对接

——新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结题优秀成果)
安徽大学211工程学科创新团队基金支持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对接

——新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顾 问 陈少峰 张德元

著 者 辛秋水 吴宗友 吴理财 李 斌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对接:——新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辛秋水等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9

ISBN 978-7-5650-0250-2

I. ①传… II. ①辛… III. 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研究—中国 IV. ①F3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65821号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对接

——新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辛秋水 等著

责任编辑 吴毅明 王磊

出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地址 合肥市屯溪路193号
邮编 230009
电话 总编室:0551—2903038
发行部:0551—2903198
网址 www.hfutpress.com.cn
E-mail press@hfutpress.com.cn

版次 2010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毫米×1010毫米 1/16
印张 16
字数 304千字
印刷 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0250-2

定价:30.00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希望更多人来做“文化扶贫”的工作

于光远

关于“扶贫”，现在人们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可是大都只注意“经济扶贫”，注意到“文化扶贫”的不多。就是我自己对这一点的认识，也很不足。我开始比较重视这件事应该说是最近辛秋水和我的谈话之后。

一个多月以前，多年不见的辛秋水同志来到我家，他也七十多了。可是还在安徽省社科院工作。来了之后向我介绍了他的文化扶贫工作。我听了之后很有兴趣。我把他留给我的材料转给一位做扶贫工作的同志。他回安徽后最近写了一封信给我，引发我一个想法，写篇文章讲讲文化扶贫问题。

辛秋水重视“文化扶贫”，也有一个过程。他认为，要实行现代化，不能只注意发展经济，还要注意文化和政治的协调发展。他说比方“像沙特阿拉伯、科威特这些石油产出国，富甲天下，但是他们至今还是绝对的封建专制、君主统治臣民的中世纪的政治制度，世人恐怕不会说他们是现代化文明国家吧”。他讲了这些年来他在农村的文化和政治建设方面的作为。他说，“我作为一介书生，要报效国家只有从我能做的地方做起。我从1988年到农村蹲点，1989年1月17日在大别山的贫困地区岳西县莲云乡腾云村破天荒地组织广大群众直接选举村民委员会，实行真正的基层民主。我想，通过不断的竞选和村民投票这些活动，就能在广大农民中间营造一个民主心理、民主环境、民主氛围，并锻炼他们的参政议政、当家作主的能力。然后由下而上，由此处到彼处，让这点星星之火逐步燎原，至少也为中国的民主政治打下了一点基础，创造一点条件。这也可能是历史脚步真正向前迈动了一步，而这一步是不容易退回来的。我的‘文化扶贫’的提出，主要根据是我恢复工作后在大别山贫困地区的调查而受到的启发。对贫困地区的扶贫，党中央确实是做了极大努力。但是从一开始年年送衣、送被、送粮、送钱，到最后发放扶贫贷款、办扶贫企业，都存在极大的缺陷。输血式的扶贫，养成当地的干部严重的依赖思想，而后来给扶贫地区发放大量的扶贫贷款，办企业、办经济实体，由于管理人员和劳动者的素质问题，往往是肥了贪官污吏，贫困农民得不了多少实惠。我得出的结论是贫困地区的贫困根源首先是人的

素质低下，智力贫困、信息贫困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明明是好事，到了那里就往往办成坏事。因而我提出‘扶贫扶人，扶智扶文’的方针。具体内容归结为‘三个基地、一个保障’。三个基地分别是：一个图书阅览室，一个贴报栏群，一个实用技术培训中心。一个保障是实行村民自治。我的这个方案从1988年开始在岳西县莲云乡进行实验，结果获得明显的成功。省委1992年决定向全省其他地市推广，又经过三年实验，1995年进行全面总结，肯定文化扶贫的方针是帮助贫困地区群众摆脱贫困的一条治本之路。并将这项工作移交给安徽省文化厅由他们管理。而我作为一个理论研究者，仍然保留着我的几个实验基地：阜阳、凤阳、岳西。这个文化扶贫实验由于媒体的介绍，国内外学者，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学者，都分别到我的实验区进行过考察、研究。虽然，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和《中国新闻记录片》早在1996年就派人到岳县进行了专题采访，分别作了20分钟和30分钟的专题报道，但始终没有引起中央决策部门的重视。”他还告诉我，“耀邦同志在世时，我同胡耀邦同志有过书信来往，他还在几个重大问题上给我的调查报告作了重要批示，对当时中央的某些决策发挥了作用。但是，耀邦同志去世后，我再也没有同中央领导人有过什么联系了。这次，有幸得到您的支持是十分难得的，望您继续给予这项事业以关照。”

我认为这件事现在主要还是要靠志愿军，因此需要做好宣传，让更多的人热心。于是我想到写文章，想到了《同舟共进》。

（原载《同舟共进》2001年第1期）

序

司马云杰

中国的现代化，最根本的是农村现代化。农村现代化不了，谈中国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

那么，怎样实现农村现代化呢？全盘西化吗？这且不说在理论上是否行得通，只要走出城市几十里，到农村看一看农民在想什么，要求什么，再看一看他们千百年来留下来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及行为方式，就可以知道化了化不了啦。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乃是其生命精神和灵魂的存在。东风可借，魂岂是可借的？特别是其作为价值体系的存在，更是如此。

走西方都市化的道路吗？西方社会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就是由大大小小的城堡组成的小公国发展起来，其经济基础是海上贸易。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由广大农村村落组成的宗法社会，它的根基是土地，经济基础是农业。如果走西方都市化的道路，牺牲农业，把农民赶到城市里来，那就等于彻底拔起了农民生存的根基，颠覆了整个中国社会存在的基础。有人主张十亿农民，农村留两亿就够了，剩下的八亿，全部迁移到城市。持这种想法的人，不知看过电视剧《天下粮仓》没有？不要说把八亿农民都迁到城市，就算减半，迁四亿农民进城，结果也不妙，它不仅会极大地打破整个城市社会结构，带来交通、能源、水源及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且一旦天下有事，如果这四亿农民问题解决不好，会给城市社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并动摇整个社会存在的基础。

中国城乡之间的差别，虽表现在经济上，然最根本的差别，还是农村文化落后。虽然原因很多，如生产力低下，经济政策存在某些偏差，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文化教育落后。文化教育进步，自然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经济落后，自然影响文化教育进步。那谁去发展经济呢？谁是经济发展最原始、最根本的生命力呢？毫无疑问是人，是亿万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农民。如果教育落后，文化发展不起来，这个最原始、最基本的生命力量发挥不了作用，再多的经济辅助政策，也很难改变城乡的差别。因此，中国农村的根本出路在文化，在教育，在于文化（包括科学）上的复兴与再造。中国城乡差别的缩小，中国整个农村的发

展与前途，全部在于文化教育的建设，在于整个中国文化的复兴。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只有在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中，才能真正找到出路与前途。

正是因为这样，秋水先生这些年在农村搞文化扶贫、科学扶贫、民主建设等等，我是赞赏支持的。而且他搞得卓有成效，开辟了一片天空，成就了一番事业，使人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出路。现在秋水先生主持编写了一部“新农村建设”的大著，可以说该书既是其多年乡村工作经验的总结，又是其文化战略的理论思考，提出了一套搞乡村文化建设新思路，引导培育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结合的新文化体系：既用现代文明之长，补传统文化之短，又用传统文化之精，补现代文明之粗，以此改造民德民智，培育造就农村新的自治力量。这个乡村建设的新思路，自然不同于过去梁漱溟、晏阳初二先生乡村文化运动建设的旧思路，但从文化上解决中国农村现代化问题，在大方向上则是一致的。因此，尽管书中一些具体提法可能有待斟酌，但在这个大思路、大方向上，则是对的，应该支持的。我比秋水先生小几岁，按理说本无资格为其书写序，推脱不了，写了这些话，算是与读者共勉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著名文化社会学家）



自序

辛秋水

泱泱华夏，以农生息；春秋代序，农泰国安。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农业文明史。书写这部历史的农民——不管在各个历史阶段人们是用如何不同的称谓去表达从事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的人们——生活在一个个农业聚居区。这些聚居区有自己的组织结构和文化形态，包含自己的生存理念。在现代社会，我们称其为乡村或者农村。在一个以农业为根本的社会，乡村建设毫无疑问是国家建设之根本所在。虽然我们使用的乡村建设是一个现代概念，但这一思路是延绵的，从古至今，任何一个聪明的或拙劣的统治者，都懂得农民——最底层积蓄的力量——对于国家社稷成败安危之基础性作用。

我们不去过多地着墨于古代社会，仅是近代中国历史的风雨激荡就足以说明农民和农村对中国社会发展及变革的根本性作用。基于此共识，在国家处于风雨飘摇的时候，依然有人关注农村，而且掀起了一场伟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它的基本思路是，立足中国传统文化本位，兼取西洋文化之长，调和改造，达致新礼俗。在这里，文化是第一次如此明显地被置于乡村建设的内涵之中，也是第一次有人强调文化形态对于乡村发展和建设的作用力。我们注意到这里的两个概念，“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这是两个按地域划分的文化子系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态。

中国传统文化恰似一条大河，虽有阻塞险滞的时候，但却源远流长。它是在中国的地理区域内，积淀而成的文化整体形态，表现为中国古代社会所形成的一系列的精神状态、社会关系、艺术风貌、语言符号和风俗习惯等的集合。只要有了人，就有了文化，但一般来说，夏、商、周三代被认为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期，同时也是奠基期，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内核就在这时候开始形成，并随着儒脉延伸逐渐深化的。从宏观历史角度考察，我们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古代的中国处于与外邻世界隔离状态的地理单元中，南部、西部有高山、沙漠，东部濒临大海，北部是人迹罕至的荒漠和冻土带。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华文化起源的本土性和独立性，培养了中国崇尚“王道”的民族

性格。古代中国内向性的地理区域同时也确保了这种文化内核的纯洁性和完整性。

我们梳理中国文化的磅礴内容，可以发现其悠久的智慧硕果。比如儒家的民本思想，就起源甚早。传世的《尚书·五子之歌》中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句子，它突出体现了这一时代政治生活中的原始民本主义色彩。孟子认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民心向背为国家政权危安所系，国君要把本身利害放在这一前提下来考虑。《尚书·盘庚》：“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尚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左传》桓公六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可见在先秦时代，在统治阶级心目中，“民”是很受尊重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民”提升到统治阶级的行列。“民惟邦本”的观念在早期国家的一个显著体现，就是原始民本主义的传统在城邦政治生活中还起着重要作用。《尚书·洪范》说周武王问政于箕子，箕子建议他除了“谋及卿士”、“谋及卜筮”外，还要“谋及庶人”。《周礼·秋官·小司寇》说：“掌朝外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尚书》言治之意者，则惟言庶民。《康诰》以下九篇，周之经纶天下之道胥在焉。”《国语·周语》说，厉王暴虐，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厉王把有怨言的民众都加以杀害，召公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厉王不听，终于引起国人暴动，把厉王赶跑。这些例子都强调了听于民的重要性。汉唐之际，民本思想依然被统治者采纳为官方意识，但封建中国的政治生态决定了这种思想只是一种为统治者服务的幌子。即使是这样，民本观念的阐述也是中国古代政治理念中的一大特色，它与现代民主政治思潮有着天然的衔接。又比如，虽然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重人文、轻自然的特点，但科学创新精神也一直存在于中国人的血脉基因里，领先的科技水平和丰富的科学成果一直是中国人的骄傲。我们有最早的月食记录；最早种植谷子和水稻；最早饲养家禽；最早用十位制记数法；最早生产漆器；最早出现化学原始形式——炼丹术；等等。另外法制思想在中国也源远流长，公元前536年，郑国“铸刑书于鼎”（刑即为法），后来，晋国也“作刑书”。郑国与晋国先后采取了把刑法铸在鼎上，制定刑法，推行法治，这在当时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开辟了法律的先河，使得民众也可按照这种明示的法律来解决社会争端。韩非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韩非子说：“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也就是说，在“法”面前，不存在贵族和平民之分。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是将法律公之于天下，“使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又别置“法官”一职，以使天下吏

民知法不犯，增进国家的安定和统治秩序的稳定。这种法律观念，一直为后来历朝历代所承袭，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维护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不过相对于人性的自由价值而言，古代的中国文化传统也表现出压抑的一面。个人集权和等级秩序的政治结构一直延续在中华民族这块古老的大地上，由此而使专制思维和人治思维也潜移默化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狭隘、保守和封建意识，把中国人的思想禁锢在一个小的圈子内；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尊卑等级观念的宗法关系被看做是一种理想的社会模式，它运作于小农意识社会环境，根深蒂固于传统社会，沿袭于中国的历史进程；以“礼”为场域而形成的一系列道德规范，增加了封建制的人身依附关系，限制、压抑了人的个性发展。

现代西洋文明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是强势的，因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持系统的封建政权已经垮台，封建制度已经崩溃，建构于这种基础之上的文化必然会被替代。西方现代文明在一百多年前进入中国，随后便茁壮成长，其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理念，也得到普遍性的尊重。全球化背景下的地域文化界限已经逐渐模糊，欧罗巴和亚细亚已经仅仅只是两个地理名词，太平洋和大西洋涌动的将是同一股潮流。现代文明不再是错落有致，它已经扩展到世界各个角落，超越各国而成为全球共享，并不断侵吞着世界的每个角落。不论是“西方中心论”，还是“中国中心论”，都只是一种无谓之争，因为中国和西方已经同步。科学思维、民主观念、法制精神、市场意识成为当今世界共同的知识结构。

现代文明是新的，传统文化是旧的，但两者并非简单对立，而是统一中的对立，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当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作为一对概念被广泛使用的时候，还有一个具有同等使用频率的相关概念，即文化传统。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是有区别的概念。传统文化更多的具有历史性，是历时性的文化整体，而文化传统则是传统文化中保存至今的内容，尚有生命力的文化沉淀。文化传统之所以存在，是由于民族传统文化承传的集体强制性。尽管民族传统文化赖以产生的土壤和支持系统已经弱化或消失，但却顽强地沉淀于民族生命基因中，编织起一面迥异于其他民族，旨在弘扬自身个性的标帜。农村是这种文化传统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地方，一些在城市社会已经彻底丧失的传统文化形态，在农村却以民俗的方式大量存在。比如：传统的社会伦理在城市正被新型平等关系伦理取代的时候，血缘、亲缘意识在农村并没有过分地被削弱。城市和农村是截然分割的，形成了两套独立的空间观念和社会治理模式，进而导致接受现代文明和现代化的步伐不一致，农村明显滞后于城市，所以才会出现中国传统文化在城乡的不同遗存的现象。但农村也绝不是拒绝现代文明，封闭只是相对的，而开放却是趋势。在过去的几十年内，文化传导效应也在城市和农村同时出现，而充当传导体的是流动人

口和信息传媒。按照生态人类学家的观点，城市与农村是侵入与接替的关系，城市是逐渐扩张的，农村是逐渐收缩的。但这只是一方面，即地域的扩张，深一层次的城市扩张是文化的扩张。地域扩张和文化扩张是不同步的，文化扩张往往是地域扩张的前奏。当前农村的文化现状就是传统农村文化在遭遇到城市扩张带来的现代价值理念后造成的文化失调。我们把这种失调表述为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城市化危机”。

如何重建农村文化？如何引导乡村的现代化？我们提倡一种“新乡村建设”，所谓“新”是区别于“旧”。“旧”是指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晏阳初等人掀起的乡村自救运动。新乡村建设的思路是文化改造，通过外力引导和内部启发培育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兼容的文化体系，用现代文明之长补传统文化之短，用传统文化之精弥现代文明之粗，用新文化改造民德民智，培育农村自治力量。新旧乡村建设的主要区别在于，旧乡村建设是在政治经济制度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对乡村的改造就只能在原有的制度框架内极其有限地得以实现，其失败的命运因而不可避免；而新乡村建设开展的背景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人民的国家，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正确方针，一切有利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先进文化的传播和扩散，有利于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举措都会得到国家和人民的支持。诸如，发源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岳西县连云乡的文化扶贫，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州市屏南乡合寨村的村民自治，都及时地得到党和政府的支持而迅速推广。

那么，新乡村建设的具体操作思路是什么？首先是科学文化的导入，即倡导以“扶贫扶人，扶智扶文”为核心的“文化扶贫”。在传统的“输血扶贫”无法产生动力机制，“造血扶贫”缺乏辅助条件的情况下，以“树人”为核心的文化扶贫围绕人及人的行为习惯——即文化，通过乡村“三个基地”（图书室、贴报栏群、实用技术培训中心）、“一个保障”（村民自治）建设，培育农村的民主文化、法治精神和科学思维，塑造一代新的农民，使之能够依靠自身力量创造财富，摆脱贫困。毛泽东同志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这是我们看待和处理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出发点。“文化扶贫”就是以培养和提高贫困人口自身内在的力量，来发展生产，脱贫致富，进而实现农村现代化。这里并不是说不需要外部力量；只是说外部力量的支持只是一个条件，是第二位的，完全靠外部力量的“输血”来脱贫致富的方针，实践证明难以达到走出贫困的目标。“文化扶贫”同外部的物质



支持相互补充，并为外部的物质支持提供条件。通过“文化扶贫”，贫困地区农民增强了致富本领，开阔了视野，提高了民主法治的参与能力和适应市场经济的本领，激发了农村社会的内在活力。从文化扶贫的产生和作用看，文化扶贫同物质扶贫关系密切，相辅相成，是一个系统工程。落后地区在扶贫攻坚中，必须把着眼点首先放在提高农民群众的自身素质上，提倡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有所作为”的精神，必须反对两手向上，单纯依靠外部施舍的“无所作为”的思想。同时，尽一切力量争取外部力量的支持。实施“大扶贫”的思想，扶贫才会有力度，扶贫工作才会出现良性循环，贫困地区才能实现持续发展的目标。其次，倡导法治文明，重建乡村文明秩序。最后，传输传统民本思想和现代民主理念，发展乡村民主，培育农村新的自治力量，以“组合竞选”方式改进民主选举制度，扩大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范畴，加大民主监督力度。以此共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新农村。

文化改造乡村是一种趋势。我们倡导新乡村建设，用嬗变后的新文化改造乡村，绝不止于一种学理上的呼吁，或者一种文化研究上的献媚，更不是对历史事件的现代注释，我们所倡导的是一种实干精神。新乡村建设既是理论，更是实践运动。目前，我们提倡的农村文化扶贫和村委会“组合竞选”实验正在向前发展，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理论指导实践，实践辉映理论。在不久的将来，新乡村建设运动必将如火如荼，熠熠华夏。那时候，也必将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时刻。

此书正是上述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初步成果，她是在我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对接——中国新农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批准号：02BSH016）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形成的。参与本书写作的同志有安徽大学社会学系吴宗友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吴理财教授、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李斌同志等。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从构思到整个框架的拟定，均得到北京大学陈少峰教授的热情参与和指点，谨向其致以诚挚的感谢！毫无疑问，本书能够顺利出版还要深深感谢安徽大学张德元教授和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总编辑钟玉海教授的大力支持。当然，没有我所长期蹲点研究的安徽岳西县、来安县和阜阳市等地领导与广大农民朋友的大力支持及卓有成效的新农村建设实践，本书更无从谈起。说到此处，感谢二字显得苍白无力，唯以此书向他们及所有关心中国农村发展的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

付印之际，作为此书负责人的我可谓诚惶诚恐，水平有限，错漏难免，祈请学界同仁和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2009年12月10日于安徽省社科院

目 录

序	司马云杰 (1)
自 序	辛秋水 (1)
第一章 导论：文化传统和新乡村建设	(1)
一、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内容体系	(1)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对接的思路	(5)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核心价值的对接	(7)
第二章 中国近现代乡村建设回眸	(10)
第一节 近现代中国乡村建设思想和实验	(10)
一、孙中山的乡村建设思想	(10)
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	(11)
三、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实验	(14)
第二节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村运动	(15)
一、土地改革	(15)
二、农业合作化	(17)
三、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	(19)
第三节 中国农村的世纪大改革	(21)
一、家庭承包责任制	(21)
二、村民自治	(23)

第三章 乡村传统文化的现代嬗变	(25)
第一节 “城市化危机”——当前的乡村文化现状	(25)
第二节 乡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关系	(37)
一、乡村现代嬗变的“文化拦路虎”	(37)
二、乡村现代文明建设的传统文化资源	(40)
第三节 一种可资借鉴的发展理论	(44)
第四节 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文明对接的思路	(49)
第四章 改造中国贫困乡村的新途径——文化扶贫	(55)
第一节 贫困——中国乡村的世纪之痛	(55)
第二节 文化贫困与贫困文化——乡村发展中的两种文化阻力	(62)
第三节 反贫困——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86)
一、文化贫困	(86)
二、贫困文化	(92)
第四节 文化扶贫——探索反贫困的新途径	(97)
第五节 文化科技扶贫与乡村全面发展	(103)
第五章 新农村建设的制度建构——村民自治	(105)
第一节 村民自治——中国乡村民主的起步	(105)
一、中国农村社会基层政权组织的变迁	(105)
二、村民自治的社会背景	(109)
三、村民自治的概念内涵	(111)
四、村民自治实践中的八大难题	(114)
五、村民自治的重要保障	(119)
第二节 四大民主——村民自治的主要内容	(121)
一、民主选举	(121)
二、民主决策	(138)
三、民主管理	(146)
四、民主监督	(150)



第三节 制度堕距——村民自治的问题探源	(156)
第六章 新乡村民主建设的科学设计——组合竞选	(160)
第一节 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模式	(160)
第二节 村民委员会“组合竞选”的基本程序和选举特点	(162)
一、基本程序	(162)
二、“组合竞选”的现实依据	(163)
三、“组合竞选”是选举制度的重大创新	(163)
第三节 “组合竞选”的试验与推广	(166)
第四节 “组合竞选”的四层面改造	(168)
一、文化改造——对“贫困文化”的反抗	(169)
二、制度改造——对农村选举制度的技术改进	(170)
三、利益改造——利益表达机制的建立和利益团体的培育	(171)
四、素质改造——对个体民主素质的锤炼	(172)
第五节 “组合竞选”与“海选”的优势对比	
——1500 份问卷调查结果	(172)
一、对选举过程的对比考察	(174)
二、对模式效果的对比考察	(178)
第六节 “组合竞选”的启示与思考	(181)
第七章 新乡村建设实践的成功模式	
——以文化—制度推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安徽岳西县莲云乡模式	(184)
第一节 岳西县莲云乡文化扶贫与村委会“组合竞选”	(185)
一、图书文化阅览室——经济发展的“加油站”	(186)
二、贴报栏——农民的情报、信息源	(188)
三、实用技术培训中心——庄稼人的学校	(191)
四、莲云乡腾云村村委会“组合竞选”	(193)
第二节 来安县邵集乡八个村的村委会“组合竞选”	(196)
第三节 颍上县王岗镇两个村的村委会“组合竞选”	(198)
一、新安村村委会“组合竞选”	(198)

二、郑湾村村委会“组合竞选”	(198)
第四节 颍上县十八里铺镇十八个村委会“组合竞选”	(200)
第五节 阜阳市阜南、颍上等县文化扶贫深入开展、硕果累累	(205)
第六节 中央领导关注：文化扶贫、村委会“组合竞选”向全国推广	(212)
一、岳西县全县实施村委会“组合竞选”	(212)
二、灵璧县全县实施村委会“组合竞选”	(217)
结束语	(219)
附录一	(224)
附录二	(226)
附录三	(227)
附录四	(228)
附录五	(231)
附录六	(237)
附录七	(238)
后 记	(239)

自序

辛秋水

泱泱华夏，以农生息；春秋代序，农泰国安。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农业文明史。书写这部历史的农民——不管在各个历史阶段人们是用如何不同的称谓去表达从事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的人们——生活在一个个农业聚居区。这些聚居区有自己的组织结构和文化形态，包含自己的生存理念。在现代社会，我们称其为乡村或者农村。在一个以农业为根本的社会，乡村建设毫无疑问是国家建设之根本所在。虽然我们使用的乡村建设是一个现代概念，但这一思路是延绵的，从古至今，任何一个聪明的或拙劣的统治者，都懂得农民——最底层积蓄的力量——对于国家社稷成败安危之基础性作用。

我们不去过多地着墨于古代社会，仅是近代中国历史的风雨激荡就足以说明农民和农村对中国社会发展及变革的根本性作用。基于此共识，在国家处于风雨飘摇的时候，依然有人关注农村，而且掀起了一场伟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它的基本思路是，立足中国传统文化本位，兼取西洋文化之长，调和改造，达致新礼俗。在这里，文化是第一次如此明显地被置于乡村建设的内涵之中，也是第一次有人强调文化形态对于乡村发展和建设的作用力。我们注意到这里的两个概念，“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这是两个按地域划分的文化子系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态。

中国传统文化恰似一条大河，虽有阻塞险滞的时候，但却源远流长。它是在中国的地理区域内，积淀而成的文化整体形态，表现为中国古代社会所形成的一系列的精神状态、社会关系、艺术风貌、语言符号和风俗习惯等的集合。只要有 了人，就有了文化，但一般来说，夏、商、周三代被认为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期，同时也是奠基期，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内核就在这时候开始形成，并随着儒脉延伸逐渐深化的。从宏观历史角度考察，我们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古代的中国处于与外邻世界隔离状态的地理单元中，南部、西部有高山、沙漠，东部濒临大海，北部是人迹罕至的荒漠和冻土带。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华文化起源的本土性和独立性，培养了中国崇尚“王道”的民族

